

忽必烈

众王之王《忽必烈》

称雄欧亚的元大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元帝



Hubilie
Emperor

珍藏版

李元秀 ◆ 编著

帝王
全传文丛
Diwang



北京燕山出版社

忽必烈

众王之王《忽必烈》

称雄欧亚的元大帝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元帝



Hubilie
Emperor

珍藏版

李元秀 ◆ 编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众王之王——忽必烈/李元秀编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0. 3
(帝王全传文丛)
ISBN 978 - 7 - 5402 - 2251 - 2
I. 众… II. 李… III. 忽必烈 (1215 ~ 1294) - 传记
IV. K827 = 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1068 号

众王之王——忽必烈

编 著: 李元秀
责任编辑: 马明仁 满 懿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印 刷: 北京海天润达明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00 印张
字 数: 58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5402 - 2251 - 2
定 价: 498.00 元 (全十册)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潜龙在渊

一	1
二	8
三	14
四	18
五	23
六	26
七	29
八	37

第二章 初露峥嵘

一	47
二	53
三	66
四	72
五	79
六	85
七	87
八	92



第三章 君臣兄弟

一	94
二	97
三	101
四	105
五	107
六	110
七	114

第四章 乱起萧墙

一	120
二	127
三	135
四	142
五	149
六	153
七	157
八	164

第五章 君临天下

一	172
二	176
三	179
四	187



五		193
六		203
七		214
八		224

第六章 襄樊之战

一		229
二		242
三		249
四		254
五		260
六		265
七		269
八		273

第七章 日落临安

一		275
二		284
三		296
四		304
五		315
六		322
七		332
八		337



第八章 秋雨潇潇

一		340
二		347
三		360
四		367
五		377
六		382
七		401
八		411

第九章 魂归大漠

一		417
二		428
三		440
四		444
五		447
六		458
七		462
八		467



第一章 潜龙在渊

众王



忽必烈



宪宗元年（1251）六月，蒙哥登上蒙古国汗位。接着，幸运之神又随之降临，忽必烈奉汗兄之命担起了总领漠南的重任。

总领漠南期间，忽必烈在延请四方文学之士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号称“金莲川幕府”的谋臣侍从集团。这个谋臣侍从集团，对忽必烈总领漠南乃至以后打造元帝国的人生历程，都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金莲川幕府”，其名源自于忽必烈奉命总领漠南军国庶务后的驻牧开府地点。该驻牧地在原金桓州附近的金莲川。

此地因夏季盛开美丽的金莲花，金世宗时由曷里济东川易名为金莲川。这批藩邸谋臣侍从随而被称为“金莲川幕府”。

幕府侍臣有：刘秉忠、赵璧、王鹗、张德辉、张文谦、窦默、姚枢、许国桢、郝经、许衡、廉希宪、商挺、刘肃、宋子贞、王恂、李昶、徐世隆、李德辉、张易、马亨、赵良弼、赵炳、张惠、李冶、杨奂等。

这些人都是中州精英和贤能智士。他们大部分是较长时间留在漠北或漠南金莲川藩邸，一小部分汉地名士或因年迈旋召旋归，并不久留。

他们地域种族各异，技能职业有别，学术派别林立，志趣主张也大多不同。

他们大体可分为邢州术数家群、理学家群、金源文学群、经邦理财群、宗教僧侣群及王府宿卫群等若干群体。他们分别从自己的学术志趣出发，阐扬各自的政治思想，希望为忽必烈所采用，竭力在总领漠南的施政中留下一些属于己方主张的印痕。

邢州术数家群。这一群体的领袖是刘秉忠，成员主要有王恂、张文谦、张

易、马亨等。

刘秉忠是邢州邢台人，于1242年随禅宗海云法师北上拜见忽必烈，留守于漠北。

刘秉忠学贯于儒、佛、道三教，尤其是“通晓音律，精算数，善推步，仰观占候，六壬遁甲，《易经》象数，《皇极邵氏》之书，无所不知”。

刘秉忠不仅“学术通神明，机算若龟策”，而且娴熟治国之道。如前述，到漠北之初，刘秉忠曾经屡次上书献策，“皆尊王庇民之事”。但忽必烈最欣赏的是其“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而且有所谓“唯朕知之，他人不得与闻”的神秘约定。

据说，刘秉忠与忽必烈“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这也是其他藩府旧臣无法企及的。

王恂是中山安喜（今河北定县）人，曾经拜学刘秉忠于邢州紫金山。以算术而闻名在藩府担任太子伴读。

张文谦是邢州沙河（今河北沙河县）人，与刘秉忠自幼是同窗好友，“年相若，志相得”，早年受刘秉忠的影响，“洞究术数”。

此后，又与许衡等交结，潜心理理之学。他被忽必烈“擢置侍从之列”，司教令笺奏，日见信任。

邢州术数家群的成员，多数是刘秉忠的同乡、同窗或门人，并且是由刘秉忠荐举进入藩邸幕府圈的。学术上也以阴阳术数为主。因为刘秉忠的缘故，邢州术数家群在藩邸幕府中称得上是最早投靠忽必烈、最受忽必烈信任的。

理学家群。这一群体主要由窦默、姚枢、许衡三位北方著名理学家组成。

窦默是广平肥乡（今河北肥乡县）人，最初以行医为职业，后来又专心学习伊洛性理之书，一度隐化大名，与姚枢、许衡朝暮讲习，1249年应召于漠北，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忽必烈对此说有所感悟，亦称：“人道之端，无大于此。失此，则不名为人，且无以立于世矣。”窦默又说：“帝王之道，在诚意正心，心既正，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一于正。”

忽必烈对此颇感兴趣，一日三次召见与之交谈，奏对皆称旨，自此，对窦默敬待礼加，不令暂离左右。窦默是理学家群中最早进入忽必烈藩邸的。曾奉命教授太子的真金、姚枢、许衡皆由他举荐。

姚枢是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人，曾从赵复处得程、朱二子性理之书，潜心研读，后成北方理学领袖之一，于1250年北伐忽必烈，上治国平天下及教



时弊之八日三十条，“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姚枢所言讲究现实，也比较注重这位蒙古宗王的认同接受程度。忽必烈惊奇于他的知识渊博，有什么事情都要去咨询他，视姚为藩邸的主要谋臣。

忽必烈虽然对空言性理的理学不太感兴趣，但窦默、姚枢二人“诚结主知”，一直受到格外得眷顾和信赖。

至于许衡，因其被举荐的时间较晚，起初仅奉王府令旨教授京兆，又兼性情古怪，所言迂腐空洞，藩邸时期的忽必烈并不喜欢他。尽管许衡在理学家群中学术造诣是最高的。

金源文学群。这一群体大多数是前金朝辞赋进士出身，率以诗赋文章相标榜。王鹗是这一群体的领袖，成员主要有徐世隆、李冶、刘肃、宋子贞、李昶等。

王鹗是开州东明（今山东东明县）人，金正大状元。1244年召赴漠北藩邸，忽必烈对他格外优待，每一次晋见，都赐予他座椅，从不直呼他姓名，而是恭敬地叫他状元。他曾给忽必烈进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常常到深夜。忽必烈颇为所论而感动，说：“我现在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怎能知道以后就不能施行呢？”

王鹗向忽必烈所举荐的多是金朝的辞赋文士。忽必烈还命令近侍阔阔、廉希宪、柴赓等五人以王鹗为师，学习汉文化。

徐世隆是陈州西华（今河南西华县）人，金正大进士。他“古文纯正明白”，“诗歌则坦夷浏亮”，“四六则骈俪亲切”。1252年徐世隆北上，见忽必烈于日月山帐殿，以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说，劝忽必烈不要去征伐云南。

李冶是真定栾城（今河北栾城县）人，金正末进士。他收藏图书极多，人曰：聚书环堵。以做文章为乐，“经为通儒，文为名家”。1257年，随使者北谒，也是忽必烈问以治道的汉文士之一。

其他属于此群体的刘肃、宋子贞、李昶等，也都是喜好文学诗赋的进士出身者。

以上王鹗、徐世隆、李冶三人进讲治道时，言必称孔孟纲常就很能说明问题。

不过，他们在崇尚标榜诗赋文章的同时，兼学兼通的多是传统的孔孟儒术，而非程朱的性理之学。

经邦理财群。这个群体的人员，通常以治国经邦为直接任务，或喜好谋划经

略，或善于理财会计。郝经、赵璧是其代表人物。

郝经是泽州陵川（今山西陵川县）人，金朝亡后，侨居保定，充世侯张柔家塾教授。郝经虽然“上溯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但又强调“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利益拘”，“不作章句儒”，立志“务为有用之学”，“以复兴斯文，道济天下为己任”。所以他平时不去理会朝政，常在家中治学。

应召赴藩邸后，郝经充任重要谋臣，上下五千年，旁征博引，援据古义，为忽必烈呈献许多救治时弊的良策。忽必烈极喜其所言，凝听忘倦，在日后的施政中多有采用。

赵璧为云中怀仁（今山西怀仁县）人。1242年被忽必烈召至漠北驻地，是忽必烈最为亲近的汉人侍从之一。

忽必烈让自己的王妃亲自为他缝制衣裳，派他驰驿出使八方，前去招聘名士王鹗、姚枢等人。还命其学习蒙古语，在马背上替忽必烈译讲《大学衍义》。

忽必烈称赵璧为秀才，那是因其颇善于草拟表章文檄，且教授蒙古生徒儒书。

然而，他“刻意吏学，以经济为己任”，后又“经画馈运”，“手校簿书”，忽必烈任命其为中书平章的制书中亦有“素闲朝政，久辅圣躬，柱石庙堂，经纶邦国”之语，故其更像是一位经邦理政的机敏儒吏。

除此以外，“能理财赋”“调军食”的李德辉；“博学有经济器”的张德辉；文武才兼备、“有经济略”的商挺；被忽必烈命为抚州长、“城邑规制，为之一新”的赵炳；担任邢州安抚司和陕西宣抚司幕官的赵良弼；“尽通诸国语”、后任治国用司副使的张惠；出身察必皇后斡耳朵媵人，又与李德辉“偕侍潜邸”的阿合马等，也基本属于这一群体。

宗教僧侣群。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吐蕃萨加派僧师八思巴、禅宗僧人海云、太一道教大师萧公弼等。

此群体人数不甚多，但对忽必烈的个人宗教信仰，以及日后元王朝的宗教政策和治理吐蕃，影响却颇大。

王府宿卫群。顾名思义，这一群体是由忽必烈王府怯薛宿卫士组成。如廉希宪、董文用、董文忠、贺仁杰、阿里海牙、许国桢、谢仲温、姚天福、高天锡、揭只里、昔班、阔阔等。

这些人都来自蒙古、色目、汉人等不同种族，平时皆负责王府的生活服侍和



护卫工作。

除廉希宪以外，王府宿卫大多没有什么突出的政见主张，也很少参与藩邸的治道问答。但他们始终是忽必烈最信赖的藩邸人员。

以上六个群体，只是就其基本特征而进行的粗略划分。实际上，六群体部分人员在志趣流派方面常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叉或复合。然而，六种类型或群体的划分，使我们对“金莲川幕府”内部构成及其与忽必烈的关系一目了然。尽管这种划分只是相对或粗略的，有其一定的局限性。

忽必烈对“金莲川幕府”及其他应召人员的态度也是比较理智的。这些侍从和应召人员形形色色、五花八门，所持主张及所怀目的也各不相同：或希望获取赏赐，或希望免除本派别门人的劳役赋税，或希望改善民众的生活并恢复中国的统一与秩序，或主张以华化夷，促使蒙古人逐渐汉化。

此时的忽必烈，对这些人大致是礼贤下士，虚己而问，兼容并蓄，没有明显地抑此褒彼，以多听多问为主，择其有用有益之处而从之。即使是对个别不友好、不合作的人，也不发怒、不失礼。

“金莲川幕府”的形成，是忽必烈主动吸收汉法制度，与中原士大夫实行政治联合的一个良好的开端。它加强了忽必烈为代表的蒙古贵族与汉族士大夫之间的彼此沟通和认同，对忽必烈履行其总领漠南的使命，也发挥了极其深刻而积极的影响。

由于这些士大夫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汉世侯幕僚属吏，“金莲川幕府”的形成，又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忽必烈和汉地世侯之间的联系。

从长远来看，它又为元帝国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方略、社会支持以及官员准备。

中统至元间，这些幕府侍从“布列台阁，分任岳牧”，成为忽必烈政权的最主要班底。他们有关汉地统治方式的一系列理论，也为忽必烈君临整个华夏描绘了一幅行之有效的政治蓝图。

简言之，此蓝图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一是以汉法治汉地；二是原有蒙古制度参考汉地等先进方式予以变通，以适应一君统治南北两方的形势需要。之后，忽必烈总领漠南以及其建立元朝整个政治生涯，基本上都是基于这幅蓝图而实践和发展的。

蒙哥初即汗位时，忽必烈便以皇太弟身份日侍圣驾，开始涉猎汗廷决策圈。他论奏时务之急，为汗兄出谋划策。

对皇弟忽必烈的上奏，蒙哥汗基本是言听计从，赐予施行。而这些奏言多为藩邸谋臣刘秉忠和张文谦一手策划和拟定。

不久，蒙哥汗降诏：“凡军民在赤佬温山南者”，皆听皇弟忽必烈统辖领治。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之初的管辖范围和权限内容。

蒙哥汗这样安排，是为了让其亲弟弟忽必烈替他执掌漠南军政大权，从而对付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等敌对势力。

忽必烈及其王府官属更是为之欢欣鼓舞，大排宴席而庆之。唯有王府文臣姚枢沉默寡言，显得心事重重。

忽必烈觉得事出必定有因，宴会结束时，急忙询问：“顷者诸人皆贺，汝独默然，岂有意耶？”姚枢回答道：“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庭臣间之，必悔见夺。不若唯手兵权，供亿之须，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

忽必烈一听，顿时大悟，深知虑所未及，未曾远谋，马上派人以姚枢的意见上奏，并获得蒙哥汗的批准。于是，忽必烈的权限和使命，就由军民兼领缩小为唯掌军事了。

自请唯掌军事，使蒙哥汗与忽必烈的权力冲突没能过早发生，从而也给忽必烈在总领漠南期间干一番事业带来了异常宝贵的机会。

另外它还说明：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已经十分成熟干练，他身旁的谋臣侍从也都是能臣智士，绝非等闲之辈。

在选择驻屯地点上，忽必烈也善于听取部下的正确建议，不拘泥于草原游牧的传统，从而作出理智的决策。

刚开始受命总领漠南时，忽必烈对木华黎孙霸突鲁说道：“今天下稍定，我欲劝主上驻蹕回鹘，以休兵息民。何如？”

霸突鲁答道：“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蹕之所，非燕不可。”

忽必烈听此言，非常感慨地说：“非卿言，我几失之。”

忽必烈将回鹘（畏兀儿）当做首选驻屯地，因为该地是突厥后裔栖居之处，在风俗和生活方式上与蒙古人都极为相似。

而“幽燕之地”，在辽、金两朝一直是国都和政治中心，木华黎国王受命经营汉地和燕京行断事官设立后，该地在极短时间内便成为蒙古国在汉地的大本营。



当忽必烈听到霸突鲁陈述驻屯幽燕更有利于经营中原和江淮等广大区域之时，便不再留恋或拘泥于回鹘（畏兀儿）地和蒙古草原游牧民的亲和性，毅然改变原来的主意，最终选定幽燕一带为自己的驻屯地。

125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占卜选择金桓州东、滦河北之龙岗，修筑开平城，以作为大军在漠南的固定驻所。开平，北连朔漠，南制中原，地理上十分适合于忽必烈总领漠南的政治军事需要。

忽必烈唯掌漠南军事以后，对漠南的民事刑法，也予以极大关注。

其时，蒙哥汗新任用的燕京等处断事官牙鲁瓦赤和不只儿负责管辖漠南汉地的财赋司法。两人上任当天便诛杀二十八人。其中一名偷盗马匹的犯人，本已施杖刑而被释放。恰巧有人献上环刀，不只儿下令追回已释放者，亲执环刀而斩之。

忽必烈得知此消息后，严词指责道：“凡死罪必详谳而后行刑。今一日杀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复斩，此何刑也？”不只儿听完，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还有一次，王府侍臣赵璧竟然敢在蒙哥汗驾前申斥燕京断事官牙鲁瓦赤以旧印妄请复用。还提议说：“请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事后，连忽必烈都说：“秀才，汝浑身是胆耶！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

这些事情都充分说明，那段时期总领漠南的忽必烈与燕京断事官之间的关系，已经多多少少有些紧张了。

不久，依照蒙古国惯例，藩邸近侍孟速思也在忽必烈位下担任燕京行台断事官。

忽必烈征大理途经六盘山时，许多地方官闻讯陆续赶来晋见，多为就自己“官资之崇卑，符节之轻重”，请求忽必烈开恩庇护。

只有延安路兵马使袁湘面陈本路军户困乏之弊并就之提出了相应的革除办法。忽必烈采纳了袁湘的意见，并给予极力赞扬。

而对其他官吏言私不言公的做法，一概责备训诫。

巩昌总帅汪德臣也来禀告新城益昌赋税徭役免除等事宜，忽必烈亦给予了批准。

如此一来，总领漠南的忽必烈在陕甘一带也留下了体恤百姓疾苦和秉公不徇私的好声誉。

二

蒙哥汗二年（1252），蒙哥大汗命令忽必烈率兵远征大理。这是忽必烈总领漠南后承担的第一次重大军事征伐活动。

依照总领漠南军国重事的使命，忽必烈负责经略征伐的目标是整个南部中国。然而，十余年来蒙古军对南宋的进攻，因在江淮和四川遭到顽强抵抗而显得举步维艰。

阔端大王对吐蕃的征伐却连连告捷，乌思藏已逐步划入蒙古军队的控制范围。

远征大理，从西南包抄夹攻南宋控制区长江中游，便成为经略南部中国战略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与征服吐蕃相辅相成的部分。另外，雄踞西南三百余年的段氏大理国，此时由于国君段兴智孱弱，大臣高氏专权，国势已走向衰落。这又是蒙古军发动远征的一个天赐良机。

夏六月时，忽必烈正式授钺专征。

当晚，忽必烈宴请各部属侍从，姚枢趁机给他讲起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未尝杀一人的故事。

第二天清晨上路，忽必烈兴奋地在马鞍上向姚枢大声喊道：“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

七月，远征大军由漠北柁牙祭旗出发。遵照蒙哥汗的旨意，全军军事由速不台子、大将兀良合台节制管领，忽必烈负责居上统辖。

征云南大军数达十万之多，主要由兀良合台的蒙古千户军、诸王抄合、也只烈所部军、汉军及王府侍从等组成。

随同忽必烈远征的侍从主要有：刘秉忠、姚枢、张文谦、廉希宪、贺仁杰、董文用、董文忠、许国桢、赵秉温、郑鼎、解诚、贾丑妮子、孛儿速等。董文用、董文忠兄弟负责督办粮草，赞襄军务。其兄长董文炳则自率义士四十六人，尾随其后，受到忽必烈的慰劳和褒奖。

忽必烈不令姚枢等侍臣离其左右，临行前还特意把原先姚枢教授皇子真金的任务转交给留在北方的窦默。

冬十二月，浩浩荡荡的大军渡过黄河。



第二年春，经原西夏盐、夏二州。夏四月，出萧关，于六盘山驻军。

京兆零郡县人贺贲修建房屋时从毁坏墙垣中获白金七千五百两，以“殿下新封秦，金出秦地，此天以授殿下”为由，持其中五千两呈献忽必烈以助其军。

某军帅怨贺贲不先禀告而直接献银，将贺贲逮捕入狱。忽必烈得知此消息，十分恼怒，下令捕捉该军帅欲杀之，后念其勋旧家世而饶其性命。由此可见，忽必烈对远征大军将帅的生杀予夺有着极高的权力。而主动呈献白金的贺贲，后受到忽必烈任用和提拔，其子贺仁杰也应召进入了忽必烈宿卫。

二十年后一日，忽必烈将贺仁杰召至御榻前，拿出白金五千两，对他说：“此汝父六盘山所献者，闻汝母来，可持以归养。”

贺仁杰推辞不收，忽必烈不允。这足见忽必烈念念不忘臣下旧日之贡献，且能予以适当报偿，体现了他较高的信誉和十足的人情味。

蒙哥汗三年（1253）八月，忽必烈率大军至临兆，九月，到达忒剌。

随后，大军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诸王抄合、也只烈率东路军，忽必烈亲自统率中路军。

四川中南部大部分地区仍被南宋所控制，三路蒙古军队只能从吐蕃东部等人迹罕至的地区绕道而行，一路上艰难跋涉，部队推进缓慢。

途经雪山时，山路曲折盘旋，包括忽必烈在内，都必须“舍骑徒步”。因忽必烈患有足疾，不得不由随从郑鼎等背负而行。遇敌军据险点扼守，郑鼎等奋不顾身，力战而护之，受到忽必烈赐马三匹的奖赏。

十月，蒙军过大渡河，又在山谷中行进二千多里，忽必烈率领的劲骑部队走在队伍最前列。

进入大理境内后，大军行至金沙江畔，忽必烈无限感慨地立在江边巨石之上，俯视波涛汹涌的金沙江水。许久，经随从提醒，才乘马回归军队。

蒙古军队乘革囊和木筏渡过金沙江，陆续攻下了顽固自守的许多寨栅。

冬十二月，忽必烈所率中路军率先包围大理城。兀良合台的西路军也在攻取龙首关后，抵达大理城下。

大理城倚点苍山，傍洱海，倚仗得天独厚的天然地理条件，相当坚固，极难攻克。开始时，忽必烈曾派玉律术、王君候、王鉴三人为使者，劝说大理归降，却都有去无还，音信全无。

大理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背城出战，以失败而告终。忽必烈下令攻城，并亲自登上点苍山临视城中战况。

当夜，大理守军节节溃败，段兴智和高祥率众逃跑。忽必烈命大将也古领兵追击，高祥被擒杀于姚州。

蒙古军入城后，忽必烈说：“城破而我使不出，计必死矣。”遂令姚枢等搜访大理国图籍，搜访时发现了三使者的尸体。

掩埋三使者遗体时，忽必烈又命令姚枢撰文致祭，以表哀思。另各赐民户数十，以抚恤死者家属。

见使者被杀，忽必烈非常愤怒，一度想屠城以泄怒。侍从张文谦、刘秉忠、姚枢等劝谏说：“杀使拒命者，其国主尔，非民之罪。”忽必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才免下了一场杀戮。

还让姚枢尽裂所携之帛为帜，书写止杀之令，分插公布于街衢。

如此一来，蒙古军士便都不敢进城抢掠，大理城民众的身家性命及官民财产才得以保全。

1244年春，忽必烈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统兵戍守，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继续经略抚治云南。

之后不久，被俘归降的大理国王段兴智面觐蒙哥汗。在其协助之下，蒙古军队较快地征服了云南全境。

忽必烈远征大理的成功，使蒙古国疆域又向西南扩展了一大块，称得上蒙古征服南部中国的一次较大的胜利。

它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迂回包抄，同时也打开了向南亚、东南亚扩展的通道。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云南“衣被皇朝，同于方夏”，纳入了蒙古王朝的直接统治，加强了云南“新民”与蒙、汉等民族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和壮大。

远征大理的成功，使忽必烈成为蒙古征服东方的大赢家。它不仅使忽必烈在艰苦的征战中经受了剑与火的庄严洗礼，也向其家族乃至整个大蒙古国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征服才能。

这对忽必烈在后来的汗位争夺中能赢得相当多蒙古诸王贵族的拥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十多年后，忽必烈本人对征伐大理之行，一直记忆犹新，异常重视。忽必烈感慨万千地说：“昔从太祖饮水黑河（班朱尼河）者，至今泽及其子若孙。其从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录其劳？”忽必烈对当年随从征伐大理的旧